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文学警钟为何而鸣

阎 纲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文学警钟为何而鸣

阎 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警钟为何而鸣/阎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5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6330 - 3

I. ①文… II. ①阎… III. ①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667 号

文学警钟为何而鸣

作 者: 阎 纲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35 千

印张: 27.75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30 - 3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阎纲

1932年生，陕西醴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兰州大学毕业后供职中国作协和中央文化部。

参编的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8家。

评论集：《文坛徜徉录》《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鸣》等12部。曾获《红旗》“首届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和“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

散文随笔杂文集：《冷落了牡丹》《惊叫与诉说》《座右鸣》《爱到深处是不忍》《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美丽的夭亡》等14部。《我吻女儿的前额》获“首届冰心散文奖”；《三十八朵荷花》获“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奖；《报告文学是与非》《我的邻居吴冠中》分别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金奖”；《五十年评坛人渐瘦》获《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头等奖。

曾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为二会的顾问。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 年 1 月 1 日



著者前言

生于乱世，喜爱文艺，稍长开始写作。

1956年到《文艺报》后，学写文学评论，推荐过《创业史》《红旗谱》《大波》《红岩》等诸多作品，服膺“革命的”现实主义，图解革命如何拯救现实，不足为训。

文革炼狱，保命不保笔。

1979年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文学回归人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的写作分为三个时段：

一、粉碎四人帮后。

二、1990年后。

三、2000年后（较多涉足杂文随笔和散文写作）。

本书所选，仅限于以上三个时间段。期间，目的性非常明确，即清除文艺迷信，重申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说真话”，不作伪，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但审美判断滞后，笔无藏锋，并没有把世事参透。

一向致力于评论文体、文风的改革，特别是评论的散文化、可读性，笔端常带感情。

作家的命运多舛，民族的灾难深重。以非凡的勇气描摹庄严的、悲剧性的艺术形象（甚至重写阿Q和“犯人李铜钟”），彰显忘我献身的创造精神，也是作家的造詣和自信。居安思危，文学为警钟而鸣！

感谢本书的编者和我的读者！

阎 纲

2011年8月14



勉励的话

屠岸 刘再复 朱寨 孟繁华

《中华文学通史》 李建军

屠岸：

“似乎也可以给阎纲的某些评论文章起一个别名：‘评论诗’。”

“阎纲的诗化的评论，不能不说是文学评论界引起特别注意的一种评论风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败得失的问题，而且也是影响着文学评论的社会地位的大问题。”

【1982年《热情和义愤的喷发》】

刘再复：

“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见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

“一群冲锋陷阵的评论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新潮的一部分。在这一评论家群中，阎纲是杰出的，他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阎纲的评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诞生，自己又具有诗人的气质，因此，他成为一个诗人型的评论家。”“读他的评论，先是感到他的语言精彩，常有丽章佳句，可读性很强，接着便会发现他的思想的明快、活跃，在精彩的语言中包含着透辟的分析并埋藏着一颗赤热的心灵。阎纲这种诗化的评论，能击中要害，敏锐地捕捉住作品的得失，给正在实践中的作家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国文艺界曾有一个时期，扬鞭者太多，扶持者太少，这实在是文坛的不幸。想想这种情况，就知道阎纲似的批评家的宝贵。扬鞭者一个



也嫌多，扶持者一万个也嫌少，到了全社会都懂得蔑视只管扬鞭、不管耕耘的人，文坛就会更有希望。所以，社会应当呼唤阎纲式的批评家多多出现。”

【1984年《时代，呼唤阎纲式的评论家》】

朱寨：

“阎纲在六十年代就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到了历史新时期，才更引人注目。他的文学批评有个性，在缜密思考中充满激情，文字犀利，被人称为‘评论诗’。”

【1986年《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
《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

《中华文学通史》：

“在新时期文学鼓吹呼唤、开拓进取的中年批评家中，阎纲是较突出的一位。”

“作为从50年代崛起的一代批评家的代表，阎纲的理论批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时期，但只有在‘文革’后，尤其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形成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喷发期。这个时期他写的文章不仅数量多、影响大，而且确立了批评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其批评的独特的个性，那就是被称为‘评论诗’的阎纲的批评风格。”

【1997年《中华文学通史》（第十卷）

“新时期活跃的理论批评家”】

孟繁华：

“在激情岁月的八十年代，阎纲先生在我心中是最具有声望的批评家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呐喊，以过人的胆识和勇武仗义执言，同时，他的批评文体独具一格，他的高亢、热情和诗性，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批评风采，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风采的一部分。面对复杂的文坛，阎纲敢于坦言自己诚实的体会，守护着健康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在那个时代，勇气有时比眼光还要重要。”

“就当年气氛和严峻性而言，对蒋子龙、张贤亮、张一弓、谌容等作家的争论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它的背后隐藏的更是观念和文艺路线的



分歧，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在情况尚不明朗的时候，文学批评是需要献身精神的。”

“我隐隐感到阎纲先生那代人的品格要比文学成就大得多。”

【2000年《阎纲先生》】

李建军：

“‘水中吐火’是古人形容小说叙事的奇异效果的意象，适合用来评价阎纲的评论文章。是的，阎纲的评论文字如‘水中吐火’，纯净而热烈，显示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挚爱和忠诚，显示着他对排抵极‘左’思潮的勇气和决绝。他是对80年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批评家。可以肯定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勇敢和无畏，没有他的仗义执言，一些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触及尖锐问题的作家，就有可能被遗忘、被埋没，一些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就有可能被遮蔽、被忽略。”

“阎纲先生90年代以来的写作兴趣在散文。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2001年《从水中吐火到火中生莲》】

有胆有识有声有色

——评阎纲的文学批评

白 烨

无论从社会影响上看，还是从个人风格上看，阎纲的文学批评都是新时期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他引人注目的是：仗义执言，不避锋芒，义愤中深含识见；实话巧说，不落俗套，平朴中自有文采。他把真情与诗意揉成一体，带来了一股清新引人的文评新风。

从五十年代起就从事文学批评的阎纲，“文革”将其评论生涯自然划分为两个时期。“文革”前，写得认真、努力，但还难在大同小异的评论面目中分出“这一个”来。“文革”后则一改故辙，面貌日新月异。新的时代再生了新的文学，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学又造就了新的阎纲。

如今，文学批评不仅更加深入文学本体、走向社会深层，而且，诸家蜂起，各领风骚，颇有一番百舸争流、群峰竞秀的气势。但即使如此，阎纲这一家并不因而失色。说实在，在我们的文学批评走出了老的象牙之塔，又有一些批评折入新的象牙之塔的情势下，阎纲的评论似乎更加显示出了自己的几分可贵和可爱。

—

阎纲在“《小说论集》后记”里谈到自己的文学评论时说：“‘文革’前，主要靠按捺不住的热情写文章，‘文革’后，主要靠不可遏止的义愤写文章。”这是自白，也是实情。“文革”后，文学在复苏中步履维艰，极左思潮、封建意识和“文革”遗风等，影响着社会，桎梏着文学。满含激愤写文章，为文学的拨乱反正而披荆斩棘，是当时许多评论家所义无反顾的。而阎纲作为其中的一员，显然以其针砭时弊、文弊的大胆和

文学
警钟
为何
而鸣



5



深切，更加豁人耳目。一九七九年前后，阎纲写作了一批紧贴现状谈理论的短文，令人震聋发聩。如《提出一个问题——以简代文》，对当时流行于文坛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提法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并用大量活生生的事例，论证了这一提法的不科学和不切实。随后发表的《文艺路线质疑》一文，更把问题挑到明处，直言不讳地指出：十七年中，“‘文艺黑线’是存在过的，‘文艺黑线专政’也是存在过的，当然，它不是被自上而下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一条刘少奇、周扬的”又粗又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而是一条货真价实的、靠强制推行的、极左的文艺黑线——它实实在在地专了我们的政”！他又不无所指地指出：“抛弃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对于文艺工作者并不产生余悸不余悸的问题，人们怕的是触犯天条。”当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尚未批判和撤销，人们都还滞留在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情况下，他这样毫不犹豫地认定十七年有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并率先开展批判，这在政治的敏锐性和坚定性之外，显然还需要无私无畏的胆魄和勇气。

作者这一时期谈论文艺方针的一些文章，也都具有这种威武气魄。如谈到十七年中“双百”方针的实行情况时说，“奇怪，这一新调儿每一奏起，旋即更弦，‘放’字音犹在耳，‘收’字马上来收拾局面。还奇怪的是，每当文艺初见好转，节目日见增多的时候，一场运动风狂雨骤，季节转瞬变为严冬，热度马上降到零点”。可说是对十七年极左思潮影响下文艺历程的深刻总结。

阎纲极力反对当代文学中的“造神”倾向，及其对于起步中的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神学·人学·文学》一文指出：“文学描写的人，变成了神以后，没有成神的人就要拜倒在神的脚下，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人学，文学而言！”“我以为，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面目，充当活生生的人学。”为使这一目标切实实现，他在《写什么》等文章里，严厉抨击“题材决定论”，主张“把禁锢完全打破，让文艺真正成为世界万物的诚实的再现”。在《人物性格》、《谈小说》等文章里，提出现实主义艺术不要失之于单调，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牢牢地植根于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社会矛盾之中”。在《走自己的文学道路》、《共产主义与文艺》等文章里，他多次论到写复杂性格的问题，指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真实性和人物生命力之所在，在复杂



中求统一，于对立中求发展。”这些，都使他成为新时期理论批评中题材广泛论、主题深化论和性格复杂论的有力鼓吹者。此外，阎纲在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离开揭露的歌颂是无力的”的意见，在爱情描写一时众说纷纭之时提出的“爱情描写不是多了，而是滥了”的意见，都是以其态度的鲜明和见地的中肯，在诸家之言中更为醒目，也更令人信服。

二

如果说阎纲的理论性文章是以政治上的无畏胆魄见长的话，那么，阎纲的批评类文章则是多以艺术上的卓异识见取胜的。文学评论是开放的思想意识与深刻的艺术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阎纲以热情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文学态势的千变万化，评介新人，卫护新花，追踪新潮，常常在面对共同文学现象的“百家争鸣”中，或从别人的忽视点着眼，或从别人的羁束处超出，以清新的声音传扬独到的发现。

他评介作家作品，从不掩饰自己的着力点，那就是用自己的理论解说阐扬新作、举荐新人。因此，与那些多以矜持态度对待新人新作的评论比起来，阎纲更显得热情洋溢和不惜笔墨，甚至往往以不无夸大之意的预言，令文坛瞩目，使作者奋起。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不久，阎纲即在一片争议声中率先撰写了《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毫无保留地予以赞赏。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刚刚发表，阎纲即以《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为题著文，着意论述作者勇于突破传统表现手法的艺术勇气和功力。贾平凹刚刚发表了数篇小说，阎纲便在《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里肯定地向人们介绍道：“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就是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仍在孜孜不倦地继承和借鉴。”张贤亮的《灵与肉》问世，阎纲在《〈灵与肉〉和张贤亮》里头一句就是着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惊呼：“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柯云路的《三千万》发表，阎纲按捺不住欣喜地及时作评，题目干脆就是“又一个阎将阎进文学”。蒋子龙写于新时期之初的几部力作，阎纲几乎每作必评，并高度称颂道：“蒋子龙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其他还如评论古华、京夫、路遥、雷铎、乌热尔图、问彬、韩冬等人创作的专文，都是在作家的创作之初，



便通过及时的评介和热情的鼓励，给他（她）们更清醒地深入文学和更矫健地驰骋文坛以可贵的助力。

阎纲评论中的断语和预言，多惊尘骇俗，然而言壮而心细，看法无不出自于细致的考察和研探，因而又大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他的许多评说具体作品的论述，也是在宏声壮言中浓缩着涵盖力和穿透力极强的感受和思考，因而寥寥数语，往往击中作家整体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要害，成为品评入理而剀切的知音之言和不易之论。他从《灵与肉》看张贤亮的创作时说道：“他悲愤交加，他伤心动情；情至极处，字字看来都是血。”评蒋子龙的几部工业题材作品时说道：“人物个性奇特，语言斩钉截铁，故事环环相扣，结局出人意料，一以贯之，一气呵成，快人快马，快刀斩乱麻。”在论析高晓声的系列创作时说道：“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语言的妙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笔法，喜剧气氛的烘托，让人拍案叫绝。”这些给作家画像的论说，从作品的最动人处入手又超出，施展了评论者深入而浅出，博观而约取的不凡功力，因而，明快而有味，形象而准确，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它在使作家认识自己、文坛了解作家两方面，都有着良好的作用。

对于受到非难的文学佳作，阎纲挺身卫护，也是突出而有力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一时遭致异议，舆论一度冷落，阎纲连夜写了《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一文慷慨陈词，认定作品是“社会某些本质方面一面公正的镜子”，指出：“深刻地‘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地歌颂，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沉沉。”文章还结合作品就如何处理“危险题材”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篇文章是有关《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评论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促使新时期文学创作进一步打破“禁区”，走向现实主义深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在摄制中就时拍时停，拍出后又有人写文章说它“在许多重大政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听到这种非议，阎纲即刻写出《为电影〔人到中年〕一辩》的文章，结合作品逐条批驳了否定影片的意见。他不仅明确指出“《人到中年》为歌颂而暴露，为爱而憎，真实感、正义感、分寸感三位一体，无可挑剔”，而且很带感情色彩地告诉人们：“我特别珍惜《人到中年》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真诚无欺的时代画图；特别珍惜《人到中年》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敏锐、智慧和勇敢精神。”衷心而勇



敢地护卫文艺“百花”的精神殷切可感。

阎纲还写过不少综合性或宏观性的论文，这些文章或综论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状况，或勾画几年来文学整体拓进的轮廓，均以疏理现象看倾向，综合个别看全局，捕捉苗头看趋势等方式，追踪着、也掀鼓着澎湃汹涌的文学大潮。《长篇小说印象记》、《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小说史上光彩的一页》、《中篇小说的兴起》、《千树万树梨花开》、《姹紫嫣红又一年》等论述小说创作面貌的文章，由具体作家作品的汇评概述一个时期的文学动向，“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新潮的特征、来由及其走向等，在及时而有力的张扬中，都有入情入理的论析。在回溯文学新历程中探悉创作新经验的《文学四年》、《文学八年》和《文学十年》，高屋建瓴，颇具分量。《文学四年》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入手，透过许多纷繁的文学现象，指出新时期四年的文学以勇敢揭示“文革”劫难，大胆反映十七年中的左倾错误和直面当前的生活矛盾，实现了主题题材的三次大突破和文艺思想的三次大分化。《文学八年》着重论述了“解放文学”向“改革文学”的成功过渡，及其在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三方面所取得的基本经验。不久前发表的《文学十年》以更带理论色彩的描述，从“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文学观念的恢复和扩大”、“创作方法的革新”三方面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新时期文学在相互交错的三条线索中突飞猛进的实绩。这表明，阎纲是以不断开放的胸襟来丰富已有的文学观念，从而求得对文学现象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的。

三

阎纲的文学批评在文体形式上的独辟蹊径，是构成他的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借以把自己同别人区别开来的鲜明标志。首先，他力求用自己的方式倾吐自己的心声，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感受。其次，使文学批评中的自我，尽可能坦诚地、对等地与读者交流和交融，从而不仅在内容上反映读者大众的愿望和意见，而且在形式上也为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所喜闻乐见，使文学批评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作为文学批评通俗化的始作俑者，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阎纲的批评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出新，以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



一、行文中的内紧外松、浑脱自然。

批评文章的写法，严肃、拘谨者居多，因为在理论概括和理性思辨中很难做到严而不板、活而不乱，也因为人们在无意识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和表述上的定势。阎纲是力图打破这种既定框式的。他的思索缜密、严谨，而表述活泼、松弛，很注意结合具体的论述对象即兴发挥、自由挥洒。评张贤亮的《灵与肉》，他在开头一段说：“在边远的西北高原上，文坛花枝招展。这里的花，我不敢妄说就是天姿国色，然而，它耐寒、悲凉而又热烈，打开《朔方》、《甘肃文艺》等西北刊物，我每每有此感觉。”接着，笔锋一转：“说实在的，我也有点恋土呢！”凸现自我的这一句，似乎是多余的一笔，然而，骤然拉短了与读者的距离，恋乡而诚实的自我，既使读者倍感亲切，又暗中交待了喜爱张贤亮作品的缘由。阎纲的许多评论文章，多是当作文艺作品来用心谋划、精心结构的。《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如同一篇记叙文，《警察与接吻》宛如一幅讽刺画，《梦李白》实为一篇寓言。《又一个厂长上任了》、《清词丽句画出灵魂》、《母爱——深广的世界》、《论陈奂生》、《鄂温克人得奖了》、《重读〈心祭〉》等，更把自己对于作品的感受化为精警凝炼的语言，用生动活泼的描述代替了古板拘谨的论述，形散神不散的风韵，使它们迹近于散文。这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吟出来的。

因为重视文章的整体结构，阎纲批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也大都出手不凡、隽永引人。开头如《最严重的》：“《鸭绿江》的读者朋友们，您也许刚刚读了本期首篇这一小说，感觉如何呢？恕我先冒昧地问一声：它是不是毒草？”又如《小说出现新写法》：“《夜的眼》吓了人一跳：‘奇怪，小说难道可以这样写？’请少安毋躁，小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结尾如《中篇小说的兴起》：“愿中篇小说创作持久不衰，愿中篇小说闯入电台，飞上银幕，装满人们的衣兜。”还如《文学艺术的新阶段》：“一九八一年乘兴而尽，一九八二年金鸡报晓。八十年代的第三个春天啊，你将给予我们文艺家以何等新鲜的灵感！”这样的开头和结尾，随意中包藏匠心，自然中不失别致，或使你接读便欲罢不能，或使你读后则余音绕梁，从而使评论的感染力大大增强。

二、表义上的以少总多、言简意赅。

古人作文，讲究语少意足、辞约义富，因而有“一语千里，一夕百年”之说。阎纲深谙这种省字约文的奥妙，他或评文，或评人，多用



“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方法，点出主要特征，以求简练而传神。这在他综论创作现象的文章中评析单个作品的特点时最为常见。如：《比较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中谈《蒲柳人家》：“天然去雕饰，富有诗情画意，用笔老练。”谈《三生石》：“细腻、婉约、典雅，把笔探进人物心灵的堂奥。”谈《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寓人情于风土中，映社会于山水间，那样自然，那样富有淡雅的韵致，又那样拨动人心。”这种美感高度凝结的点悟式评论，虽然少一种理性的思辨，却在简捷而形象地揭示作品风格特征方面，别有自家之长。分析某一人物形象，阎纲也常常尽可能地在表述上以少胜多，如《文学四年》中论析陈奂生，“他生长在做主人的社会，却没有获得主人的资格；但是，他毕竟要做主人了”。一句话概括了陈奂生的过去和现在的全部行状。

阎纲不仅力求表述上的持一当十，还力求一种言近旨远、辞浅意深的效果。如说《将军吟》的题旨：“是《将军吟》，也是将军难、将军魂。”说《小镇上的将军》的构思：“将军死了，小镇复活了。”说《人到中年》的现实意义：“可以当诤谏来读。”说杂文的命运：“本身就是一篇杂文。”这些断语既是深中肯綮的知音之论，又在极省简的语言里包孕了十分丰厚的内容。它精警凝炼如诗句，在表意的概括性中又具有某种不精确性、跳跃性和多义性，因而既能引人入胜，又诱启人遐想。

三、语言上的活用口语和文白杂糅。

极富个性的语言文字，是阎纲别有音色的批评风格的重要构成，个中之核心，便是对民间口语的独到运用和文言与俗语的有机融合，从而使语言平中出奇，朴中见色。他在《中篇小说的兴起》中论到短篇不及中篇的缘由时说道：“短篇毕竟太短，故事人物毕竟单纯，‘不解馋’。”把人们常在口边的“不解馋”三个字用在这里，恰切而又形象，比任何别的语言都更有力和有味。在《〈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序》里谈到蒋子龙的创作丰收时，阎纲这样写道：“在七九年以来作家们竞相写作中篇的高潮中，蒋子龙足月之后的中篇小说临盆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是血肉之躯。”话语肆口而出，朴俗中满带雅意。这里，真用得着清人孙麟趾的一句话：“街谈巷语，入文人之笔，便成绝妙文章。”

在语言的文白杂糅方面，阎纲有时是让叙述语言稍带些许文言味道，约文以显义，如评孙犁创作的一段话：“孙犁为文，不尚威武，不擂鼙鼓，注重从容的谈笑和隽永的柔情。他不囿于结构，不埋伏线，自然